

發展研究與 當代臺灣社會

簡旭伸 王振寰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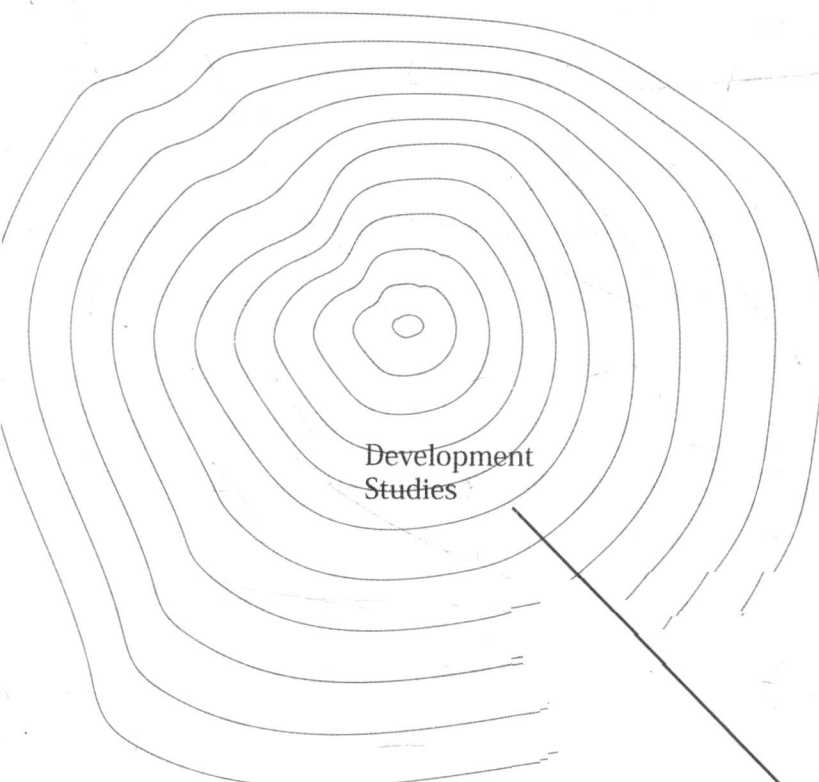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Contemporary
Taiwan
Society



發展研究與 當代臺灣社會

巨流



Development
Studies

簡旭伸 王振寰
——主編

and
Contemporary
Taiwan
Society

發展研究與 當代臺灣社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 / 簡旭伸, 王振寰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巨流, 2016.10
面: 公分

ISBN 978-957-732-528-0 (平裝)

1. 區域研究 2. 國家發展 3. 臺灣社會 4. 文集

733.07

105016374

主 任 編 輯 簡旭伸、王振寰
封 面 設 計 張如芷
Lucas

發 行 人 楊曉華
總 編 輯 蔡國彬

出 版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 07-2265267
傳真: 07-2264697
e-mail: chuliu@liwen.com.tw
網址: <http://www.liwen.com.tw>

編 輯 部 22445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41號
電話: 02-29229075
傳真: 02-29220464

郵 撥 帳 號 01002323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購 書 專 線 07-2265267 轉 236

法 律 顧 問 林廷隆律師
電話: 02-29658212

出版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 978-957-732-528-0 (平裝)
初版一刷 · 2016年10月

定價: 650 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目錄

導論 發展研究概述：理論發展與研究方法 王振寰、簡旭伸	1
Part 1 空間尺度下的不同發展作用者與觀點	29
第一章 全球南方觀點下的國際發展與援助 簡旭伸、吳奕辰	31
第二章 國家與後進發展 許甘霖、王振寰	65
第三章 國家內部次區域發展：東臺灣的論述與經驗 夏黎明、林玉茹、黃宣衡	95
第四章 新都市：超越空間尺度的城市研究之開展 戴伯芬	123
第五章 社區發展與治理創新 湯京平	151
第六章 從個體與性別不平等思考人類發展 李碧涵、蕭全政	177
Part 2 經濟與產業	211
第七章 區域經濟整合：從全球化到區域化 童振源	213
第八章 技術變遷：後進國家的技術學習 陳良治、朱凌毅	239
第九章 勞動參與：發展變遷中勞動者的角色 黃德北	267
第十章 臺灣農業與鄉村的困境及其出路 徐世榮、李展其、廖麗敏	293
第十一章 文化產業：歷史、文化重構與後現代經濟 李玉瑛	327
Part 3 社會與公民權	353
第十二章 健康與發展 黃嵩立	355
第十三章 土地與住宅：住宅做為商品或社會人權？ 黃麗玲	381

第十四章 輪到誰來犧牲？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之環境、生態與社會風險

| 周桂田、王瑞庚

409

第十五章「去政治」的原住民族發展——人權保障的觀點 | 高德義、施正鋒 439

第十六章 資本主義全球化與跨國移民 / 工現象 | 夏曉鵬

467

導論

發展研究概述：理論發展與研究方法¹

王振寰、簡旭伸

一、前言

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顧名思義，關心的就是「發展」，從社會科學出生開始，發展此一概念主要關切的就是經濟發展。理論家所追求的是國富民強的理論和政策方針。早期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相信科學和工業化，可以帶來人類的福祉。而非西方的後進國家要發展，就是學習西方、追趕西方（金耀基，1986）。最簡單可以量化的方式，就是觀察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金額越多的國家就代表越發展和越先進。這個看法一直是當時學界的主流，立基於以國家為分析單位，隱含的預設是國富了，人民自然也就富裕幸福了。但現今則被批評太過於強調經濟成長，忽略平等、種族、性別、城鄉差距等重要問題。因此，有諸多學者強調另類發展（alternative development），指涉不以經濟成長為優先，發展需要考量人民參與、福祉、社區以及弱勢者的利益（Sen, 1999）。這樣的發展考量，重新定義發展的面向，從以國家為主的經濟發展考量，轉移到個人、社區、參與以及平等為主，且強調發展是要符合人民需要、與大自然和平相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發展（Pieterse, 1998）。

不論是主流或是非主流的另類發展論述，現今都碰到更為嚴峻的挑戰，那就是永續發展的問題。氣候的急速變遷，以及大自然的災害，是當今世界的重大困境，人類如何面對大自然，從災害中重建並建構永續的環境，對科學家或是政策制訂者，都是嚴峻的挑戰（Giddens, 2009）。社會科學家需要用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像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1992,

¹ 本文部分內容刊登在《都市與計畫》，第九卷第2期。在此答謝《都市與計畫》編委會同意轉載。

2006) 提出的反身性發展 (reflexive development)，正可提供我們思辯發展的方向。

本文首先介紹發展研究的歷史和不同學派的辯證；之後，提出進行發展研究時可能面臨的倫理問題與研究偏誤，以及基本研究設計注意事項。再來，討論發展研究的機構建制，包括首先有發展研究機構的英國，以及美國與臺灣等相關發展。最後，將簡介本書的內容及其在發展研究中的定位。

二、發展研究的理論發展

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就認為人定勝天，透過科學的知識可以征服大自然，以工程的力量可以將大自然改造為人所所用、造福社會，達到富裕、福祉、自由和平等的境界。這樣的信仰，表現在十八、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知識的起源中，模仿自然科學的定律法則，尋求社會發展規律，以便了解並進而改造社會。社會科學的緣起，因此帶有相當強烈的富國強民色彩，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例如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國富論，強調只要市場自由，就會使社會自然分工、各取所需，達到國家富裕、人民安康的地步。

經濟學推崇市場力量的理論觀點，在十九世紀的社會學和政治學有相當多的反省和批判。例如，馬克思 (Karl Marx) 的資本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自由，只會讓資本家得到自由，卻會造成工人的不自由和被剝削；因此國家必須介入干預市場運作，才可能創造既富裕又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固然推崇理性主義造就西方資本主義，但他也批判現代性造成龐大的官僚體系，使得現代人成為沒有靈魂的組織人。然而，即使馬克思或韋伯對於現代性或現代資本主義有強烈的批判，他們對於現代性能帶來進步和發展的信仰，卻根植在其思想體系中。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典型的代表。馬克思本人非常相信科學，因此他在資本論中，一直尋找資本運作的根本規律，並透過規律探討到達最高階段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韋伯也相同，他相信理性人是西方特有的，是造成「西方之成為現代西方」這樣高度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他因此探求理性主義的宗教起源，且用這假

設比較世界各文明，並解釋為何資本主義只出現在西方而不在其他地區。

亞當·斯密、馬克思、韋伯各自代表了不同發展研究的理論傳統和根源，也就是強調市場、國家、和理性組織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角色，他們的理論觀點影響了後來發展研究的取向，也使得後來的發展研究都承襲啟蒙運動以來的共同信念——對科學力量的信仰，其公式就是進步等於工業化，工業化等於成長，成長等於富裕，富裕等於自由。

這種對現代性的信仰，表現在二次戰後，歐美社會科學界對原先被殖民、但戰後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解釋（王振寰，2009a）。第一個重要觀點要屬現代化（modernization）理論。現代化理論的觀點主導了1950年代以來歐美社會科學對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看法，直到1970年代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興起之後才受到挑戰。²簡單來說，這個觀點非常強調「發展就是經濟發展」，並且認為要發展就要學習西方的各種制度。這看法隱含西方優越主義的意識型態，也就是假定社會是二元演化的，是從低度發展的農業社會逐漸演化到以工業為主的經濟模式。重要的是，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低度發展，是由於內部社會文化因素所致，包括宗教信仰、儲蓄習慣、工作倫理、和缺乏個人主義的成就動機等。而落後地區的低度發展，因此需要克服某些內在的社會文化因素，才能邁向現代化。這個理論深深影響戰後美國、英國、世界銀行等國際單位對外援助的做法。

具強烈西方優越主義色彩的現代化理論，嚴重忽略西方社會是透過幾世紀的殖民主義，剝削和壓榨非西方社會，才得到富裕，並且造成原殖民地社會在發展上的困難。這項理論的看法，1960年代之後受到來自拉丁美洲學者為主所建構的依賴理論的挑戰，其觀點也主導1970年代的發展研究。依賴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低度發展不是自然狀態，而是由於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而且持續參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分工，更惡化其低

2 現代化理論的起源，有很大一部分與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對於區域研究的支持有關。當時美國政府為了有系統地掌握各國情勢以做為國家安全政策參考之用，以大量經費支持和發展出以地理區域（非研究議題）為劃分基準的「區域研究」（area study），這也是後來大量出版比較政治和政治發展書籍的起源，例如Huntington（1968）。

度發展。也就是全球核心都會區在財力、人力、組織和政治上的強勢，使得後進衛星區的經濟成為供應都會區需求的附庸，沒有自己發展的動力，淪落為經濟上的依賴關係。換言之，已開發國家的發展與第三世界的低度發展是一體的兩面。進一步來說，他們認為這樣的依賴關係，強化了第三世界國內的階級壓迫，因為經濟的依賴關係，使得這些國家的領導者也越來越依賴先進國家的支持，以武力和經濟的投資來維護其政權和獨裁。因此，依賴理論認為只要持續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分工體系內，第三世界很難脫離低度發展的狀態。不過，雖然依賴理論突顯現代化理論的問題，但是也未能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導致脫離資本主義未必有利於其發展。這也是1970年代末期，卡多索（Cardoso, 1979）和伊凡斯（Evans, 1979）以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理論來修正依賴理論的原因，他們認為只要國家機器政策得宜，跨國公司投資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有正面的作用。

這樣的依賴發展理論，在東亞的發展經驗中，得到更多的支持。相對於拉丁美洲的低度發展，戰後的東亞，從日本到東亞四小龍的臺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都在經濟上發展快速。它們並非脫離資本主義，而是利用本身的秉賦條件，吸引外資，並以適宜的國家政策，帶動國內產業和促進經濟發展（王振寰，2003；Amsden, 1989；Wade, 1990）。由於在這些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政策具有帶動作用，因此被賦予一個「發展型國家」的封號。但一方面，發展型國家的特色，就是國家官僚具有決策自主性，而這個自主性是建立在威權政治體制的條件上；另一方面，東亞各國威權體制的建立，與戰後美國支持的圍堵社會主義地緣政治有關（Onis, 1991），當1980年代全球開始走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美國不再支持威權體制，而國內的政治轉型邁向民主化之後，這樣的國家官僚自主決策的能力，也就逐漸消失。

隨著全球在1980年代開始進入新的階段，依賴理論主導的發展研究所強調的第三世界主義備受質疑，因為該理論並未提出替代方案，況且在1980年代之後，福利國家瓦解、東亞崛起、新自由主義興起，全球化的概念和政策逐漸影響國際組織和各國政策，發展研究進入一個「發展危機」時期（Booth, 1994）。具體而言，與下列的幾個趨勢有關。

首先，西方社會福特主義危機，使得強調市場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如日中天，除了福利國家的各項政策飽受衝擊外，連帶也使得強調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和做法，備受質疑（Jessop, 1994）。發展研究和政策在此背景下，也被認為沒有必要，因為市場本身就可以解決發展的問題。其次，1980年代一連串的福特主義危機、拉丁美洲發展的失敗、社會主義政權的崩潰、加上東亞發展的成功，使得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學術上失去地位，馬克思主義的大論述也失去解釋力，取而代之的是虛無的後現代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但後者並未能找出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優先方案。第三，相對於很多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的大力介入救災和人道救援，並產生實質的社會經濟影響，發展理論被質疑太抽象而無力處理現實的第三世界發展問題，也提不出新的對策（Booth, 1994）。

發展研究的危機，讓學者不得不審慎面對學科的危機，特別是當自己訓練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甚至因此被大學當局威脅系所將要關門時，如何將危機化為轉機就是發展研究必須面對的情境。發展研究在1990年代重新出發，將危機化為轉機，主要歸功於以下三個趨勢。

1. 世界銀行對發展的重新界定

過去世界銀行的對外援助，主要以市場的方法要求受援國建立市場。但1990年代之後，這樣的信仰逐漸受到挑戰，世界銀行開始對於政府帶動經濟發展的角色給予肯定。最經典的著作就是世界銀行在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蹟》，首次肯定東亞經濟發展中政府的帶動角色。此外，兩個重要趨勢也帶動了世界銀行重新思考國際援助的方式。第一，長期對外援助的NGOs從事的社區工作，對當地社會的影響逐漸顯現。這些NGOs的工作，從扶貧、衛生、婦女、教育、和農業改良等工作，實際改善了第三世界很多地區的生活，而這些工作，讓世界銀行對於對外援助計畫產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個相關趨勢，則來自沈恩（Amartya Sen）對於發展、貧窮和飢荒的研究，包括對於發展的定義，需要考慮非物質層面的發展，像是個人能力的發展、福祉、幸福感等。他的研究後來引發世界銀行發展「人類發展

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將發展的定義從單純的經濟面向擴張到社會、文化、性別和個人能力發展等面向。除此之外，由於沈恩（1984, 1999）對於貧窮研究的引發，很多政府的方案與 NGOs 開始重視飢荒的社會文化因素，世界銀行也開始重視發展與治理（governance）的問題，並出版了《發展與治理》（1992）一書。治理的概念在 1990 年代第一次進入世界銀行的詞彙之中。在世界銀行的用法裡，治理是指一個國家對於用來管理發展相關之經濟和社會資源的權力使用方式，而善治（good governance）則指涉良善的發展管理。善治指涉國家、民間社會、參與、以及社會資本等重要面向，也就是發展需要民間的參與，而民間的參與需要動用社會關係，讓發展不再是少數人受惠，而是透過社會的動員，使得其方案是社會大部分人能受惠的。因此，世界銀行在此階段認為社會資本的應用，應可以強化後進國家的產業和社會發展，降低交易成本及不確定性。因此，對後進國家而言，發展社會資本可說是一舉數得的社會發展策略，也開始大力推動社會資本與發展關係的研究和政策方案（Woolcock, 1998）。

2. 環境生態與永續發展問題

發展研究在過去很少關切環境議題，然隨著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環境汙染，經濟發展是否能夠持續，人類是否能夠在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下生存，越來越受到高度的關切。早在 1962 年由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 1962）所著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即引發了全世界對環境保護的關注。該書詳細闡述了殺蟲劑，尤其是滴滴涕（DDT）對野生生物的危害，是造成鳥類滅絕的主要元兇，原本生意盎然的春天變得非常寂靜。這本書迅速引起公眾輿論的注意，並影響美國政府對劇毒殺蟲劑的危害進行調查，並成立環境保護局。之後，在 1972 年，由科學家及經濟學家所組成的「羅馬俱樂部」也發表《成長之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報告書，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和工業化模式不變的話，人類的成長將於十年內達到極限。

科學家一系列的研究，引發各國關注，1972 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

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人類環境宣言》，呼籲全球合力保護地球資源，並將之傳至後世子孫。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布蘭特報告（Brundtland Report）——《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指出我們當代的發展不應以後代子孫為代價，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這本報告因此對「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做出了經典的定義：「在保護環境的條件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人需求的發展模式。」之後，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那盧聯合國主辦的「地球高峰會議」上，一致支持永續發展的理念，通過《聯合國廿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並有一百五十五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做為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方案。這方案也成為之後1997年《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以減緩全球氣候變化的具體措施，目的在「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

環境議題的出現，衝擊了一直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發展研究。雖然發展研究學者對於非洲農業的研究，早已指出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與飢荒的出現有高度相關。農業的商品化，例如為了種植咖啡，將大片森林砍伐，而咖啡樹含水量有限，因此對水土保持並無太大的作用，而一旦氣候乾旱，或是農作物的國際價格下跌，就會造成大片農田荒廢，地表土流失，使得無食物可吃而造成嚴重飢荒。過去的農民自給自足，不必依賴商品經濟，也不受國際價格影響。如今商品化之後，耕作單一作物，放棄賴以維生的農作物，一旦國際價格下跌，飢荒就容易出現。因此，農業問題與環境和氣候變遷有高度相關。後續的發展研究，因此逐漸將永續發展的議題納入，並發現經濟發展與環境惡化之間的高度相關性，開發中國家如何面對加速工業化，又要維持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是學術界和政策界頭痛的問題。

對於永續發展，諾貝爾獎得主 Elinor Ostrom（1990）的《公共財的治理》（*Governing the Common*），為全球暖化問題提出新的思維方式。在賽局理論中，公有地（例如環境）是大家的，因此每個人都會盡力使用，造成公有地的條件惡化。然從很多傳統部落對公有林地和漁場的研究中，她發現要有效管理公共財，是需要人們發揮合作的精神，成立許多的小組織保護他們

的公共財，並且對成員施加獎懲機制。這樣的做法在共有的漁場、林地都看到績效，而績效也建立在社區共有的社會資本上。Ostrom 的研究帶動很多研究者，從社區行動和社會資本的角度介入研究環境議題，而與前面所提的治理研究結合。如今環境和永續發展，在發展研究領域已經成為顯學。

對環境永續發展的研究，特別出現在當今由於天災、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災難和重建的研究上。過去對於天災和重建的研究，傾向以外來的自然災害的定位，而對社會層面的研究，通常也都傾向災後調適，或是如何動用社會政治資源救災和重建，並以重建規劃為災區未來發展的藍圖做為主要研究議題。不過由於氣候變遷的關係，惡劣氣候和暴風暴雨成為常態，如何在平時就能建構有用的社會資本，以及動用社會資源面對環境災害，已經成為當今環境和發展研究的重點。在這些研究重點中，脆弱性（vulnerability）與能耐（capability）和社會韌性（resilience）是討論的重點（Pelling, 2003）。脆弱性指的是社會人為的制度或做法，使得人們在面對災難時相當無助。能耐是指人們擁有能夠抗拒、適應或從災難中復原的資源或資產。脆弱性指涉的是面對災難的負面因素，而能耐則是指正面的因素。最後韌性則是指二者的綜合能力，意謂一個社區或社會做為一個整體，面對災難時，能達到可以正常運行的調適能力，也就是社會或社區至少可以回復到災難之前的運行狀況。這樣的研究取向，將自然科學、工程和社會科學結合發展研究，是發展與災害研究的新趨勢。

對於自然天災的研究，發展研究仍有一個重大爭議，也就是科學研究與社區參與之間的矛盾（周桂田，2007）。過去的研究和政府做法，通常以科學家的知識為主，要求居民配合遷移、救災或重建。但越來越多的案例顯示，國家或科學家的做法，經常遠離地方知識，也不顧及人們對家園的感受。然隨著越來越多的 NGOs 介入災區重建，發現人們對科學家的知識經常有所質疑，對重建和發展也有相當不同的意見。因此，社區參與有其必要，然而如何將科學知識和社區參與融合而非對立，也是發展研究當今面對的重大研究與政策上的議題。

3. 全球化的新議題

1990年代，人類社會進入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狀況，也就是由於資訊和通訊科技發展，使得全球性的整合和連結成為可能。具體而言，全球化意味著地理限制的瓦解，透過通訊資訊科技，瞬間的資訊流動可以克服地理的限制，造成空間限制被時間征服，因此全球化也是一個時空壓縮的過程（Harvey, 1989）。社會學家紀丁斯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空間與時間分化的過程，也是現代化的深化。過去人們認為是國家內部的問題，在現今已經取決全球的尺度（scale），而不能只以國內的角度來研究。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一國的碳排放和空氣汙染，影響的不會只有國內，而是超越國土範圍；同樣地，一國的金融風暴，可以造成全球不景氣，而非只是當事國的內部問題（Held et al., 1999）。全球化的確改變了世界，而當今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正是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動力，也有人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然而，全球化是否真的如華盛頓共識所宣稱的，可以有利於全球和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則有相當多爭議。現有的資料可以說明，全球化一方面的確對少數能對全球經濟採取積極吸引外資的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和後來的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金磚四國造成有利的影響；但對其餘第三世界國家，例如非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則未必那麼清楚地產生正面作用（王振寰，2003）。進一步來說，東亞的經濟體從過去的傳統產業，現今已經升級到高科技創新和服務產業（瞿宛文與安士敦，2003），而部分產業則外移到中國大陸或其他落後地區，產生區域整合的現象。這樣的產業外移和區域整合，很大原因與全球商品價值鏈的切割、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造成新的世界分工有關（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 Ernst and Kim, 2002）。此外，全球化導致全球尺度的貧富差距擴大，貧窮的開發中國家仍然可以產生富可敵國的富豪，而富裕的已開發國家也有衣不蔽體的窮人。換言之，過去宣稱的南北差異，現今已經成為過去；以全球為尺度的階級差異正在產生。

由於全球化所產生出來的發展問題，使得發展研究需要用新視野來面對新的局勢。全球金融的無縫隙流動，使得華爾街控制了全球經濟，但也造成

和擴大民族國家主導的文明衝突；全球化的國家競爭也導致爭相奪取能源，導致戰爭不斷發生；全球化的移民，導致人口流動快速，加大了族群之間的緊張；更甚的是，由於國家之間的競爭，全球性的二氧化碳減量沒有辦法有效遏止，大國之間爾虞我詐，沒有誠心想要保護地球。例如美國至今仍未簽署《京都議定書》；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碳排放國，但仍堅持「經濟發展優先，和普遍但有所區分的責任」；澳大利亞開始不願簽署，後來才在 2007 年補簽；而加拿大甚至在 2011 年退出京都協議等。這些新的議題，將過去發展研究的議題，更擴大為全球尺度，但另一方面也突顯很多發展的議題，其實是多尺度的（multi-scale），而問題的解決和策略，需要多尺度、多層次、跨學科共同探討（Bulkeley, 2005）。

因此，發展研究在 1990 年代之後，因為世界銀行對發展的重新界定，環境和永續發展的議題，以及全球化的全面影響，而進到新的階段。在理論上，不再只是關心經濟發展，而是擴張到社會發展、政治民主參與，和環境永續的議題。在這些議題之下，富裕、正義、公平、福祉、永續仍然是發展研究關切的核心，但是發展研究長期以來探討社會經濟發展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權力、族群、階級、性別等等，已經在空間尺度和關切層面，做出新的調整，以面對新的全球化情境。

簡單來說，1990 年代以來的發展研究，衍生出一個綜合深入地方和社區參與，以及關注全球尺度的多尺度、多層次另類發展觀點。與過去強調以國家為單位，以政策來帶動經濟發展的思考和政策模式相當不同。假如說前者是一種「由上而下」來帶動經濟成長的觀點，那麼「另類發展」的觀點就是反過來強調「由下而上」的模式，著重以人民、社區、參與、環境友好的政策和做法，帶動發展（Pieterse, 1998）並與全球連結。³ 相對於主流的發展

3 例如「城市氣候保護計畫」（The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就是一個跨國但又是以地方政府為主角，以從事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組織網絡。於 1993 年由地方政府國際協會以及聯合國環境計畫聯合支持成立的「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來推動的計畫，現今有六百七十五個城市，超過三十個國家加入會員。「城市氣候保護計畫」積極協助參與的城市會員，提出地方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行動策略。這些城市做的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目標是當地的環境保護，但影響卻是全球的；其聯盟是全球的，但地方政府又附屬於各國政府，因此是一個多空間尺度且各空間尺度相互滲透的組織型態（Bulkeley, 2005）。「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現今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

觀點，強調的是整體經濟的發展，另類發展的觀點則強調個人能親身體驗的社區或社群經濟，重視公共參與大於行政效率，環境友善重於經濟成長。因此，另類發展重新界定了發展的意義，不再將國民所得視為發展的重心，而是以人、感情、社區為重心。

這種由下而上的另類發展觀點與做法，主要是 1990 年代以來全球的 NGOs 大力推動的發展方式。這種另類發展觀點不相信市場，也不相信國家，只願意相信自食其力的做法。此觀點正好填補了 1980 年代發展研究危機時期的真空，以 NGOs 的實際參與外援的模式，為發展研究走出一條新的道路（Pieterse, 1998: 348），有進步的意義但又不會太激進，有實際的策略和做法但又沒有清楚可辨的意識型態。也因此，這樣的另類發展得到來自當時「失意的左派」和進步的保守派的大力支持。

然而另類發展其實不是一個學說，也缺乏清楚的理論說詞。它沒有國家發展的政策取向，也不覺得其做法需要顧及社會主流的想法。簡單來說，它是一些既不滿意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優先，也不願意屈服傳統左派國家主義統制經濟做法的一些想法的聚合體。因此，它也很難成為替代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相對地，由於看到 NGOs 大力介入社會救援，進入落後地區參與和發展社區經濟，並有效改善當地人民生活的成效，使得另類發展的想法反而逐漸被主流的國際組織和發展理論所納入。例如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很多政策和計畫，都已經將這些 NGOs 的想法融入國際援助計畫中，例如社會發展計畫、社會資本計畫、扶貧計畫、民主參與計畫等，都清楚看到 NGOs 的影子，因此現今也很難界定這些主要的國際援助計畫只以經濟發展為主，或忽略了參與、婦女和公共性。另類發展的想法已經被納入國際體制中，如今已經難以區分主流與另類（Pieterse, 1998）。

當原來的另類不再那麼另類，而且當另類發展不能提供對當今全球環境惡化和發展途徑的解答時，發展研究需要更積極正面地採取以全球為尺度的理論觀點。但可惜的是，當氣候變遷的局勢嚴峻，人們面對天災風險和各式各樣的科技風險（例如核能）增加時，至今仍看不到一個積極有效的思路。

架公約》的年度締約國會議中，扮演重量級角色。

也許這正是我們面對的「後現代」或「第二現代情境」。「第二現代」是當代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提出的論點，他認為第一現代就是工業化，是二分原則，例如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好壞區隔的價值選擇清楚分明。然而在現今的第二現代，很多原來明晰的原則不再清楚，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衝突，第二現代是一個全球的風險社會（global risk society），因此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模式（Beck, 1992），而這需要有意識地改變既有的二元思維和政策作為；既有的另類發展論點只提供解構而沒有積極的對策。貝克所提出的對策，就是反身性治理（reflexive governance），或是反身性發展。這概念意謂所有的發展政策和做法，需要反思其回應與失敗，並將回應和限制納入新的模式中。這是一個來回反覆的過程，包括對發展政策本身的修正和人民參與到該過程中。在這樣的治理體系下，只有民主參與是不變的，其餘的決策就像在實驗室，經常由於新變數的影響而受到修正；在反身性治理模式中，國家不再像過去一樣有能力，而受制於非正式的政治運作。正式的政治和非正式的政治已經難以區辨。進一步從全球風險社會的角度出發，現今需要大家認識到，發展已經不能只以單一國家來看待，現今的環境、恐怖主義等風險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的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合作，單邊主義則無法解決風險的問題（Beck, 2006）。

貝克的理論，可看成另一個以全球為尺度的「另類發展」理論，他認為既然風險是全球的，那麼反身性也需要各個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參與，並且給各國政府壓力和回饋，這樣的發展，才不會又回到國家和市場決定的老路，透過各國公民參與到國家發展決策中，社會的風險才可能降低，也才可能有全球性的永續發展。⁴

總之，從社會科學發展至今，發展一詞的意思有很大的變遷，從過去強調經濟發展和國家／市場，如今已經逐漸轉移到除了經濟之外的政治參與、公民社會、扶貧、婦女、和平等。這些議題隨著時代變遷，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發展研究並未消失，而且隨著全球化進行得既廣且深的情況下，發展

4 從理論和現實政治的角度，貝克的理論是一個典範的移轉，他的看法點出了過去以國家為範圍的風險和災害治理已經不足，而必須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待，也需要各國和各國的公民社會共同合作。